

一个古史传说的嫁接

——东魏邺城形制研究

王 静¹, 沈睿文²

(1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2 北京大学 考古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东魏营都邺南城, 为了营造成天下文化、政权的正统所在, 巧妙地利用古漳河的泛滥与大禹治水时“河出图, 洛出书”神话的相似性, 而将后者嫁接在前者之上, 并试图实现其象征意义的替代。在实际操作上不仅制造了“筑城得龟”的事实, 而且切实依照龟的形状来营建邺南城, 将城墙修筑成龟的形状, 这跟杂以缙纆占侯的河北经学的御用是分不开的。此外, 邺南城在建材方面甚至直接取自洛阳。并且在大布局上也模仿洛阳, 在周围兴建石窟寺、营建墓葬区; 同时, 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这一切都是源于在天下鼎峙的政治格局下, 东魏统治者欲图将邺城营建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正朔的中心。

关键词: 邺南城; 神龟; 正朔

中图分类号: 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6)03-0086-06

古代中国的城邑布局是一项以《周礼》所载为圭臬的礼制建设, 不惟有其内部布局的变化规则, 它与周围的地理、人文环境, 特别是与墓葬、宗教建筑的相对关系也已成为礼制的有机组成。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小布局, 后者称为大布局, 二者都跟王朝的政治、文化相关联。无疑, 大布局需要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思考城邑、墓葬以及石窟寺等诸多元素的关系, 而恰好是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触及, 上述元素多被割裂开来单独讨论^①。实际上, 从大布局入手更能全面地凸显城邑在政权建设中所承载的政治意蕴和国家意志。东魏邺城的营建便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公元534年, 以洛阳为都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高欢立元善见即位, 是为东魏孝静皇帝。同年十一月下诏迁都邺城。邺城在前燕王朝灭亡一百六十余年后再次为国都, 因原来的邺北城已经残破, 加之自洛阳迁“户四十万”至邺, 京都的扩建

或新建非常紧迫。次年, 在邺北城之南增筑南城。此一般称作邺南城, 但当时邺北城仍未弃用。两个东西并峙的新生政权皆以“魏”自称, 兼之江左萧氏共成鼎立的局势, 此刻正朔名分对政权而言就益显重要。政权的文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而新都城的选址和建设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统治者自会不失时机地周密筹划。于是, 在建城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这么一个故事。《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邺都南城条引无名氏《邺中记》云:

〔邺南〕城东西六里, 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 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 大[]方丈, 其堵堞之状, 咸以龟象焉。〔1〕(第45册, P23叶正面)

如何解读“筑城得龟”的故事?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

收稿日期: 2005-12-09

作者简介: 王静(1974—), 女, 山东烟台人,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① 现已有学者注意从更为广大的空间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如王静《终南山与长安社会》,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29—168页。而卫星遥感技术、GPS等技术的采用使这个视野的实现有了更大的可能, 并已有所成效。如秦建明、董鸿闻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 《文博》2003年第3期, 第43—48页。

当时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永嘉乱后,由于河洛名士的南迁,尊崇汉代经学传统的河北经学成为北学的主体。汉代的讖纬之学自然也在其承继之中,而杂以讖纬占候也实为北方经学的一个特点^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又给占卜、讖纬的流行提供了滋养的土壤,直至北朝此风不减。讖纬经常巧妙地与政权相互利用,成为深入人心之政治神话。这恐怕也是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太武帝下诏将沙门与师巫、讖记一起禁绝的原因之一^②。但是,北魏末的卜、讖之风复盛^③。天下虽有无巧不成书之事,但若将它置于此背景之下,我们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个新生政权精心编造的神讖。

邺南城的营构由尚书令右仆射高隆之负责,主要参与施工设计的有辛术、李业兴、张熠等。他们都曾生活于北魏洛阳城,对洛阳城的熟悉自不在话下。其中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2](卷八四《李业兴传》, P1861),是一位善于运用讖纬的儒士。东魏天平四年(537, 梁大同三年)李业兴出使梁朝,曾与朱异及梁武帝有过关于郊丘和明堂规制的对答。李业兴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而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④,即笃守郑注,兼采讖纬。精通术数的李业兴,其相关看法经常被作为国家重大举措的参考,《北史》载“神武以〔李〕业兴明术数,军行常问焉”[3](卷八—《李业兴传》, P2725),此在修筑邺南城中也不例外。《魏书》卷八四《李业兴传》云:

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问。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天平二年,除镇南将军,寻为侍读。于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业兴共参其事。[2](P1862)

可见,李业兴因其博闻多识而得以具体负责设计,带领画工勾描蓝图。其意见在营建邺南城时起了主导作用,应是具体的策划者和施行者,大概也是李业兴之流利用讖纬大作舆论。换言之,精通术数的李业兴极可能便是这个神讖的始作俑者。

环境对人类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个神讖便是巧妙地利用古漳河的泛滥与大禹治水时“河出图,洛出书”神话的相似性,而将后者嫁接在前者之上,并试图实现其象征意义的替代。

古漳河或曰老漳河,旧分三道。南道由河南至直隶,大名入卫,这就是今天的漳河。中道由大名分支东北行,历旧广平、河间、天津诸府入运河,这就是所谓的老漳河,它是漳河的正支,也就是《水经》中所记载的。北道则由河南分支历旧广平、顺德二府,北行入宁晋泊。合滏阳、滹沱,这就是俗称的小漳河。因漳河洪水经常泛滥成灾,邺

① 详唐长孺《南北学风的差异》,载所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242页。此风亦波及释教,可参严耀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讖言与佛教》,《史林》2000年第4期,第12—17页。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97页。

③ 《北史》卷八九《艺术传上》载:“时又有沙门灵远者,不知何许人,有道术。尝言〔朱〕荣成败,预知其时。又言代魏者齐,葛荣闻之,故自号齐。”《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928页。又如《魏书》卷八一《山伟传》载河阴之变前夕,山伟与袁升等人“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魏书》,第1793页。

④ 见《魏书》,第1863—1864页。

⑤ 刘长旭先生认为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存在水崇拜与投尸入河的习俗,从正史看所涉及的民族包括当时的羯、拓跋鲜卑、慕容鲜卑、慕容胡以及鲜卑化的汉人,所涉及的习俗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盛行期:后赵中后期、拓跋政权初期、北魏末期与北齐前期。投尸入河是统治者胡化的标志,其盛行与否成为政权汉化与否以及汉化程度深浅的一个标志。详所撰《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水崇拜与投尸入河习俗稽释——以拓跋鲜卑族为主要对象》,《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3期,第107—112页。

地的土豪和巫婆相互勾结,搞“河伯娶妇”^⑤,坑害百姓。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西门豹为此治邺,人所共闻,不遑赘举。但是,漳河洪水在南北朝时仍旧经常泛滥成灾,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一点与大禹治水传说的背景相同,无疑在客观上给这个神谕的制造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给制造者一种创意的灵感。

古史中的洪水,可谓世界范围内的传说,这在《圣经》以及西亚等古代传说中都有记述,汉文化则是大禹治水。这个传说见于《尚书·尧典》,在金文中亦载有所谓“禹迹”^①。且不论是否确有大禹其人,考古学的证据已经表明在所谓的大禹时代中国确有一次洪水的存在^②。近年,上海博物馆《容成氏》简的整理,给我们披露了有关大禹的更为详细的行状^③,无疑充实了我们对大禹的认识。“河出图,洛出书”是大禹治水、乃至天下的重要法门。“洛书”与乌龟有关,今存《孝经援神契》辑文中即有7处提到此类神龟^④(P951—994)。禹治洪水,赐洛书。“洛出书”说的是大禹在洛水(即洛阳地区)治水时有一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龟背上的纹路就是所谓的洛书,大禹根据纹路的指示治理了天下的水患。这个神话至少有这么两层意思。其一,洛龟的出现是跟平定天下水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有可能蕴含着借此平息漳河水患的意义;其二,洛书与河图代表了古人的天下观,暗示着当时的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如《孝经援神契》便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4](P961页),这实已成为一种文化共识和认同。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此谶纬之风已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⑤,是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而禹得洛书存在治水及受舜禅等不同说法,这种多义性客观上也给了李业兴之流自如发挥的空间。谶纬中,唯有禹两观河洛,分

别在受舜禅的前后:治水观河而得金瑞,受禅观洛而得洛书^⑥。将这个谶纬置于当时天下鼎峙的政治格局中,它的被嫁接正好说明了东魏始建国者的用心所在,也恰反映出故事的始作俑者以邺城为天下之中的企图,这就是将邺城营造成天下文化、政权的正统所在。事实上,邺南城的建设正是围绕这个宗旨进行的。前引《魏书》卷八四《李业兴传》称:

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

“宪章前代”,《通鉴》胡注云“宪章前代者,以前代为法度也”^[5](卷一四五,P4517),其中应该包含典章制度的内容。这方面已有相当之研究,兹不赘述。“模写洛京”所指的应该是邺南城的布局和北魏洛阳城的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后者不但被前者“模写”,其宫殿的建筑材料等更被直接拆运到邺南城使用。此外,设计者们一定程度参与过北魏洛阳的建设,加之邺南城基本全部为新建,更易表达营造设计者的意图构想。前面说到“河出图,洛出书”有两层意思,其中以“前代为法度”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取代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洛阳已经不再是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学术的南迁至南朝和河北学术在北朝的崛起与主宰地位应该是统治者最为敏感的,东魏的定都邺城应该正是统治者的这种战略眼光的反映^⑥。在占据了河北学术的中心邺城之后,摆在东魏统治者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在人们心目中迅捷营建起邺城取代洛阳成为天下中心的观念。而这一切正是通过对“洛出书”这个代表天下观的神话传说进行偷梁换柱而得到集中体现,于是,“筑城得龟”的故事便出现了。此外,我们还

① 顾颉刚先生对此曾有辩证,详所撰《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中编,1926年,第106—133页。

② 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第57—67页。

③ 邱德修《从上博〈容成氏〉简揭开大禹治水之谜》,http://www.bamsilkbook.com。

④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建构》,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66—275页。

⑤ 徐兴无,同上揭文,第272—273页。

⑥ 周一良先生曾从战略等方面剖析了以邺为都的原因,详所撰《读〈邺中记〉》,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此据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4—480页。

注意到在邺南城西华门内近今尚有一河图村(图1),不知是否也与此神讖有关?暂且附笔于此,以待进一步考察。

但是,东魏的统治者不单单只是创造这么一个神讖,同时更将之付诸行动进行模写洛阳的一切。其内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首先,在实际操作上切实依照龟的形状来营建邺南城,将城墙修筑成龟的形状(图1)。邺南城城垣东、南、西三面城墙外侧筑有“马面”,现共钻探出50座。“马面”为长方形,宽18米左右,伸出城墙12米左右,马面夯土层厚约10厘米。实测南城最宽处东西2800、南北3460米,稍小于文献记载。南城东、南、西三面城垣遗迹不是呈直线分布,每面城墙均有舒缓的弯曲,东西墙中部向外弧出,而南城东南、西南角为弧形圆角^①,城拐角处基槽既宽且深,又使得其形制特殊,状似龟形。南墙中部及左右两侧中部向内缩进,中部朱明门处两阙及附属建筑向南探出为瓮城,两边的城墙向里凹进,使得南城朱明门部分平面酷似乌龟的头部^②。考古钻探与发掘又表明,邺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护城河存在。此与文献所载“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相符。护城河与城墙基本平行,河距西墙约28米,距东、南墙约有120米,其宽20米,深约1.8米,城门外处略窄,以便于架桥。东南城角、西南城角外护城河,其内岸呈弧形圆角,外岸基本近直角,致使此处河面甚宽。由此可见,“神龟”不仅是一个神讖,而且应该是李业兴勾绘的并付诸实施的邺南城的建设蓝图。

这与龟形相近的城垣与马面、护城河确实构成了邺南城坚固实用、特色独具的防御体系。实际上,邺南城所谓龟象(马面)的建筑设施及“周流城郭”的做法在北魏洛阳城早已有之。因此,邺南城的上述所为实际上是仿自北魏洛阳城。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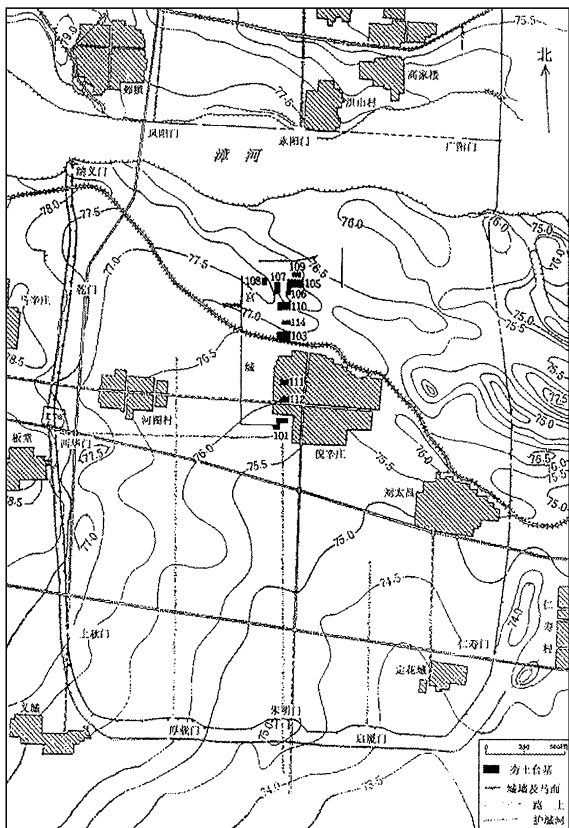


图1 东魏邺南城遗址实测图

邺南城的宫市位置及门阙名称也无一不沿袭北魏洛阳城之旧。其用意恐已非仅停留在简单的名称上的模仿?

其次,中国古代城邑与邻近的墓葬区和宗教区如佛教石窟寺在城邑布局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是一种制度。这一点从邺城大布局的变化可以得到证明。曹魏时,邺北城只有西侧高岗上有所谓曹操的陵墓——高陵,而不见其他的墓群;这时期也不见与邺北城配套规划的佛教石窟。这一切都表明此时的邺北城尽管也是“王业之本基”,但实际上在时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取代洛阳的中心地位,尽管曹魏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权力中心

①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第9—1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第27—32页(另,本文图1改绘自页28图一,恕不再指出)。相关研究可参徐光冀《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01—215页。

② 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省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第1—9页。相关研究可参郭义孚《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考古》1996年第1期,第10—21页。董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瓮城的起源可溯自垣曲商城,详所撰《瓮城溯源——垣曲商城遗址研究之一》,《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第48页。

都城在地理上的转移与建设来实现新生政权的权威性。遗憾的是,固有的观念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一点从曹魏的最后定都洛阳以及同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安排在洛阳北邙可以得到印证。北魏的迁都洛阳实际上也正是看中了洛阳在政治文化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到了东魏的邺南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邺南城不仅在形态的若干方面模仿,甚至在建材上直接采用洛阳城的东西——已如前述,而且在大布局上也完全模仿,只不过是根据邺城的具体地理形势作了适当的变通。洛阳的墓葬区主要集中在城北部的邙山,东魏邺城墓葬同样集中安排在北郊。另外,北响堂山石窟也在邺南城北开凿,其建造的上限在东魏天平元年(534),至迟在东魏武定五年(547),石窟已基本建成^①。这表明石窟的开建与迁都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由此也给我们透露出石窟寺与邺南城是统筹设计的大布局的一个内容,只是石窟寺不再位于都城中轴线的南延长线上。这一点不同于洛阳城时期。

再次,如前所论,北魏分裂后,争取政治、文化上的正朔成为第一要事。这不仅只是邺城在形制上与洛阳的趋同,更重要的要同时进行文化心理建设——除了制度上的沿袭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以及此后历代政权对洛阳汉魏石经的迁转。

汉石经即熹平石经,石经是由汉代著名书法家蔡邕、马日磾、刘弘、张文、傅祯、左立、孙表等人书写。内容分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石经刻石表里刻字,每块石上刻字卅五行,每行七十字至七十八字,总共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个字。魏石经即古、篆、隶三体石经。石经的背景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代表儒家经典话语,原立在北魏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前。北魏分裂后,历代统治者对汉魏石经都十分关注。《魏书》卷一二《孝静帝本纪》载武定四年(546)“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2](P308)。从东魏迁邺后,正值漳河洪水,河岸崩陷,

石经没于水中,后在宫外露天陈放。天保元年(550)秋八月,齐文宣帝下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学馆,依次修立”[3](卷七《齐文宣帝本纪》, P247)。但石经终未修立于学馆,故皇建元年(560)八月,齐孝昭帝又下诏:“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3](卷七《齐孝昭帝本纪》, P269)北周灭齐后,大象元年(579)二月辛卯,周宣帝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②。迁徙石经大多跟统治者的政治新举措有关。如齐孝昭帝的施列石经是跟改元、及其对两汉魏晋古典和礼仪体式的仰议、提倡联系在一起。而如果我们将周宣帝的迁徙石经到洛阳跟他同时的改元、改号及车服旗鼓等一系列措施结合起来便不难发现徙汉魏石经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隋开皇六年(586),又将石经从洛阳迁至大兴城,后在战乱中散佚,或为建筑的柱础或下落不明。唐贞观年间,魏征搜集时已是十石存一了。从上不难看出石经是随着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而迁徙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代王朝对汉文化传统的恪守、尊奉和标榜,它已经完完全全地融会成统治者的统治术了。这一点,即便东魏政权也不例外。由此益见,邺都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著^③。

综上,东魏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矢志不移地在形态、材质以及整体布局上来营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都城,最后也达到了该目的。此可从考古上获取有力的支持,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一个反映天下观的古史传说集中体现出来。这一举措跟当时统治者积极地进行文化建设有着莫大的关系。邺南城中,天子居住的宫城更是直接模仿周礼“三朝苞门”的制度建筑,这无疑为政权正朔建设中的又一神来之笔。《周礼》被历代政权崇奉为圭臬,其所载制度亦被尊奉为政权建设的根本文本。在宫城直接模仿周礼“三朝苞门”建筑制度的做法,其用意便不言自明了。若将此举置于东、西魏以及江左萧氏鼎峙的政治格局,则其意义更得以彰显。将邺城营造成天下之中,树立东魏政权为文化正

① 赵立春《从文献资料论响堂山石窟的开凿年代》,《文物春秋》2002年第2期,第27—30页。

② 见《北史》卷一〇《周宣帝本纪》,第375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2页。

朔,这便是东魏修建邺南城“筑城得龟”神讖背后深刻的动机。

此外,在古代中国还有不少城邑在营建过程中也出现类似的传说。如《蜀中广记》卷六〇云:

扬雄《蜀本纪》云:“张仪城成都,辄颓坏。时见大龟出于江,回旋而行。仪以问巫,巫曰:‘循龟迹筑城功可就。’乃从之,至今蜀人呼为‘龟城’。”《戎幕闲谈》曰:“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成都。昨询访耆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古物尚在,而武臣泯之,深可惜也。[6](第592册, P19下栏—P20上栏)

则借用洛龟平息水患的意义。此风至今尚屡

见不鲜,足见它已浸变成习俗并成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惟其中含义已不尽同,更多的是跟勘輿术有关。

参考文献:

- [1] [明]崔铣.嘉靖彰德府志[A].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Z].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1964.
- [2] [北齐]魏收.魏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唐]李延寿.北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孝经援神契[A].安居香山、中村彰八.纬书集成(中)[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O].北京:中华书局,1956.
- [6] [明]曹学.蜀中广记[O].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A Research on the Arrangement of Yanan City of Eastern Wei

WANG Jing¹, SHEN Rui-wen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ity of Ye'nan, the proposed capital of Eastern Wei, a future centre of cultur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ts architects deliberately made use of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flood of the old Zhang River and the legend of Dayu's successful control of water by "re-discovering" a stone tortoise when building the city, which had in fact been buried there earlier. Meanwhile, the city was built not only in the exact shape of the tortoise, but also with materials from Luoyang, capital of Northern Wei, the dynasty that preceded Eastern Wei. The overall plan of Ye'nan was also modeled on the latter, with cave temples and a cemetery outside the city, and a series of the constructions aimed at creating a cultural milieu which suited a capital.

Key words: Ye'nan city; tortoise; legitimacy

(责任编辑 郑园)